

MIGRANT WORKERS:

SOCIAL
DISTANCE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农民工： 社会距离与制度分析

*Migrant Workers: Social Distance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卢国显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农民工： 社会距离与制度分析

*Migrant Workers: Social Distance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卢国显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民工: 社会距离与制度分析/卢国显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97 - 1710 - 3

I. ①农… II. ①卢… III. ①农民 - 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①D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8561 号

农民工: 社会距离与制度分析

著 者 / 卢国显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负责 / 董根兴

责任编辑 / 郑 熾

责任校对 / 涂 恺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0.8

字 数 / 361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710 - 3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在进入 21 世纪之初的几年里，我明显感到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有很大问题。有一次在从西客站坐车去中国人民大学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大概是刚下火车的农民模样的人和我同坐一辆公交车。刚上车不久，车上的乘务员就与那个农民模样的人发生了争执，原因大概是那个乘客拿的包袱太多，乘务员让他付双份的乘车费，但是那个乘客不同意。乘务员极其蛮横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那几年，我们曾经到北京市的很多地方做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调查，接触了解农民工的机会比较多。在接触农民工的过程中，我们听到和看到了很多市民与农民工发生矛盾与冲突的事情。当时我觉得，如果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关注起城市农民工的生活境况。之后，带着对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的兴趣，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巴沟村、五道口、四季青等地进行问卷调查，顺利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当时是用西方社会距离理论来观察和思考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融合问题。在博士论文中，我从西方社会距离理论推演出经济地位假设、文化假设、空间隔离假设和接触机会假设。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处于“中、远距离”的等级，农民工认为，进京以来，他们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缩小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结果。

上述结果也仅代表北京海淀区的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状况，并不能说明全国其他城市的社会距离状况，当时研究的代表性是值得质疑的。2004年我有幸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继续开展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研究。当时设想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做问卷调查，通过分析数据了解几个大城市的社会距离状况，并进行对比研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实际的调查地点却是北京、石家庄和广州。经过对问卷进行整理后，广州和石家庄的有效问卷只剩下几十份，其余大部分样本来自北京市的石景山区、丰台区和宣武区。

这次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出来以后，我惊奇地发现，农民工与市民的距离依然是以“中、远距离”为主，农民工与市民对社会距离的评价依然存在非对称性，即农民工认为他们之间的距离较小，而市民认为距离较大。主观上，农民工与市民的距离较小，但客观上，他们之间的交往却非常少，交往距离大于主观距离。具体而言，他们之间理解程度较高，但相互信任程度较低。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市民都希望与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交往。相比较而言，同事距离最小，其次是邻里距离，最大的是婚姻距离。三大城市的调查数据显示，有78.1%的市民和73.2%的农民工认为他们与对方没有发生过冲突。有21.9%的市民和26.8%的农民工认为他们与对方发生过冲突。从社会距离的发展趋势来看，经过对重要指标的数据进行比较以后发现，从2002年到2006年这四年间，北京市的农民工与市民的距离有略微变大的趋势，农民工认为他们与市民的主观距离缩小了，但同事距离扩大了。市民认为他们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

新的研究框架是建立在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重点想检验制度性因素，如文化、态度等变量对社会距离的影响程度。数据分析结果又进一步证实了经济地位、文化差异、空间隔离、交往频率、非正式制度因素与社会距离的相关性。农民工和市民的经济地位差异和社会距离的扩大与缩小之间有较显著的相关性。制度性变量，

如态度变量与文化变量,对社会距离有较大影响。空间隔离(职业隔离和居住隔离)与社会距离的相关性也非常明显。数据分析显示,交往距离(行为距离)与主观距离(心理距离)之间的相关性同样明显。换句话说,经济地位较高、文化程度较高,与市民接触较多的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较小;而经济地位较高、文化程度较高,与农民工接触较少的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较大。空间隔离对社会距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接触频率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非正式制度因素(如市民在心理上同情和歧视农民工的程度)与社会距离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制度对社会距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城市制度对农民工就业、交往的影响,可以清晰地追溯到市民心理上的排斥和不接纳。同时,数据分析结果还显示,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大小还与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冲突、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政治参与以及安全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越大,他们之间的冲突频率越高,农民工参加非正式组织的频率也越高。社会距离越小,农民工越愿意参与城市的治安活动。当然,社会距离大小与安全感也有相关性,社会距离越大,农民工越没有安全感。由此可见,社会距离大小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从而也说明了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大小的重要性。

针对经济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空间隔离、非正式制度因素对社会距离的影响,我们就要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制定能够缩小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和促进社会融合的社会政策。本书认为,在社会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充分认识到单位制在解决农民工生活上的重要地位。当然,改革户籍制度和保障制度等制度,是提高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关键举措,而改革土地制度是解决农民工城市化问题和融合问题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本书认为,户籍制度、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与社会融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三项制度的改革最为关键的是同步进行,相互协调,避免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相互隔

离，最好是组建新的组织机构，用于协调各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改革进程。同时，本书认为，不应忽视高科技在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技术因素对于突破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瓶颈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本书提出开发第二代身份证多功能智能卡，充分发挥智能卡身份认证、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功能。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本书还明确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原则和具体操作步骤，也对土地制度改革的目的、原则和模式选择进行了讨论。当然，选举制度、人事制度、司法制度，以及职业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制度的改革，对于缩小文化差距、改善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我国大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研究证明，西方学者关于社会距离的理论解释，也同样也适用于解释我国大城市不同群体或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过，本书不但验证了西方社会距离理论的解释力，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提出并验证了制度性因素对于社会距离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本书使用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社会距离产生原因的分析，对于丰富社会距离理论也具有一定的贡献。本书提出的“非合作间接博弈与非合作直接博弈”概念，应该说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尝试。

时间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们在公交车上已经看不到像以往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做法了。表面上看来，城市市民对待农民工的态度比前些年友好多了，但在内心深处，市民与农民工的距离在短时间内还无法缩小，态度和认识的转变毕竟需要一个过程。不过，随着城市市民对农民工认识的彻底转变，政策调整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调整的进程会越来越快。再加上农民工同市民接触与交往的持续深入，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会不断得到全面提高，社会经济地位也会逐步得到提高，文化距离会不断缩小，融合应该只是早晚的问题。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调查活动	55
第一章 社会距离的统计描述	71
第一节 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类型	71
第二节 农民工与市民的主观距离	74
第三节 农民工与市民的交往距离	85
第四节 农民工与市民的通婚意愿	97
第五节 农民工与市民同事的社会距离	103
第六节 农民工的邻里社会距离	111
第二章 社会距离的地位分析	116
第一节 制度、文化、地位与社会距离	116
第二节 经济地位对社会距离的影响	121
第三章 社会距离的文化分析	134
第一节 农民工与市民文化的差异	134
第二节 文化差异与社会距离的相关性	137
第三节 文化、距离与制度变迁	146

第四章 非正式制度与社会距离	152
第一节 非正式制度与社会距离	152
第二节 非正式制度的统计描述	157
第三节 制度评价与社会距离的相关性分析	166
第五章 空间隔离与社会距离	171
第一节 农民工与市民的隔离状况	171
第二节 空间隔离与社会距离的相关性分析	174
第三节 文化差异与空间隔离的关系	177
第六章 交往频率与主观距离	180
第一节 交往频率与心理距离的相互影响	180
第二节 交往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184
第三节 主观距离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186
第七章 制度、距离与冲突	189
第一节 西方社会学对社会冲突的研究	189
第二节 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描述	195
第三节 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原因分析	198
第四节 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性质与功能	203
第五节 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预防与处置	206
第八章 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组织化	210
第一节 农民工组织化的意义与研究状况	210
第二节 农民工的组织化状况	214
第三节 农民工组织参与问题的原因分析	220
第四节 农民工组织化的实现途径和政策建议	224

第九章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治安参与与社会距离	232
第一节 农民工的政治地位	232
第二节 社会距离与治安参与的关系	236
第三节 政治地位缺失的制度分析	241
第四节 加快政治融合的政策建议	246
第十章 社会距离、社会安全与公共安全	247
第一节 基本概念	247
第二节 农民工的社会安全状况	250
第三节 社会距离、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的相互关系	251
第十一章 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256
第一节 制度结构失调与制度创新	256
第二节 制度的功能与非合作间接博弈	260
第三节 技术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267
第十二章 单位制、社区制与农民工政策	271
第一节 单位制与社区制的内涵及其演变	271
第二节 社区制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的局限性	274
第十三章 社会距离与户籍制度改革	279
第一节 户籍制度的内涵、分析框架与阶段性划分	279
第二节 户籍制度的功能演变与结构分化	281
第三节 户籍身份与社会融合：描述与相关分析	303
第四节 户籍制度的合理性评价与社会距离的 相关性分析	306
第五节 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	309

第十四章	社会距离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315
第一节	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315
第二节	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形成的原因.....	326
第三节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建议.....	329
第十五章	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与创新	339
第一节	土地制度概述.....	339
第二节	土地制度的沿革及功能变化.....	341
第三节	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状况.....	353
第四节	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原因与政策建议.....	356
第十六章	结论：距离与制度创新	372
第一节	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状况及制度的影响.....	372
第二节	社会距离的功能及其对秩序的影响.....	379
第三节	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发展趋势： 以北京市为例.....	382
第四节	促进社会融合的制度创新.....	389
致 谢		394
参考文献		396

导 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综述

一 问题的提出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由于推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国农村出现了部分“离土不离乡”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少数农村精英开始外出进城打工。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跨地区流动，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形成了大规模的“民工潮”。此后，农村外出流动人口的规模一直居高不下，成为当今中国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这就是农民工现象。在界定农民工的概念上，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认识。李培林认为，流动民工这个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三种流动：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向比其高的职业收入阶层流动^①。王春光从四个层面对农民工作了界定，即，一是职业，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职业，或者以非农工

^①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第 44 页。

作为主要职业，也就是说，他们的绝大部分劳动时间花在非农活动上，他们的主要收入也来自非农活动；二是制度身份，尽管他们是非农从业者，但他们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与具有非农户籍身份的人有着明显的身份差别；三是劳动关系，农民工属于被雇佣者，雇佣他们的可以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或外企老板，也可以是国有单位或集体单位，其他拥有农业户口身份、从事非农活动，但不被他人雇用的人不属于农民工，而应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四是地域，即他们来自农村，是农村人口。总之，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①

有些学者专门对“农民工”进行了界定：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有少量的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依靠打工收入维持家庭生活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这个群体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从职业来看，他们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从收入来源来看，外出打工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他们在城市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在农村拥有少量土地的经营权，但也有一些农民工已出租甚至转让了对土地的经营权；在社会身份方面，尽管他们长期从事非农产业，但受户籍制度的影响，他们依然没有摆脱“农民”的身份，是一群具有“农民”身份的产业工人。可见，从职业、收入来源、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来看，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显然已具备了工人的基本特征^②。农民工规模相当庞大，据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估计，2002年，仅进城农民工约为9460万人^③。近年来进城农民工的数量还在不断上升，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通过对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进行的抽样调查、

① 王春光：《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07～308页。

② 钱正武：《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2006年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第13～16页。

③ 新华社重庆4月1日电：《去年我国外出务工农民近亿》，2003年4月2日《中国青年报》。

农业部的跟踪调查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入农民工的统计这三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并综合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①。近期的数据证明,农民工的数量已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

关于“市民”的概念,《辞海》中,市民是指:①在古罗马,指享有公民权的罗马人,以别于没有公民权的外来移民。②指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居民。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出现而形成,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等,他们反对封建领主,要求改革社会经济制度。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市民逐步分化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③泛指住在城市的本国公民。④有的学者认为“市民一般是指长期或固定生活、工作在城里,以非农产业为劳动对象的居民。”^⑤对于中国来说,市民具有以下四个特征:具有城市户籍,生活、工作在城里,从事非农产业,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相联系^⑥。有人指出,市民通常是指拥有城市户籍身份的群体,他们相对占有较多的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享有体制下的一些优惠政策和最低生活保障,享有政府给予的各项福利,而且他们通常隶属于城市的某个组织。市民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出生起就居住在本城市,拥有本城市户籍;另一类则是从外地迁居本城市,转为本城市户籍。

建立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重要思想。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的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农村居民与城

①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第3~4页。

②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993页。

③ 吕柯:《浅议“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主要障碍》,《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④ 马桂萍:《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演进与创新》,辽宁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第7~8页。

市居民（市民）之间缺乏大规模的直接交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变化，农村居民才开始进入城市就业、居住和生活，有机会与市民发生实质性的接触。

在农民进城初期，由于流动人口规模比较小，农民工与市民之间还能够和睦相处。伴随着城市流动人口规模的逐年增加，犯罪率不断升高，街道越来越拥挤，环境越来越恶化，资源越来越紧张，城市秩序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市民对农民工的排斥和歧视取代了宽容和谅解，农民工对市民的怨恨和仇视取代了感激和尊重，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增加，双方关系一度非常紧张。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问题潜在地影响着城市社会乃至全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有学者开始使用“社会距离”一词来描述城市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①。针对这种矛盾与冲突，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制度是根本性影响因素。以往学者们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定量研究较少。本书主要旨趣是，一方面通过定量研究，比较直观地了解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状况，另一方面，归纳整理中西方学者对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的研究状况，并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影响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的因素进行检验。

二 社会距离的研究状况

（一）欧洲早期社会学对社会距离的研究

社会距离研究发源于欧洲，较早可追溯到法国的塔尔德、迪尔凯姆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齐美尔和戈夫曼等人。后经芝加哥学派罗伯特·帕克的介绍，社会距离研究传到美国。在 20 世纪初期，美国学术界曾经掀起了一股社会距离的研究热潮，有很多学者在社会距离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让我们首先简要了解一下社会学初创时期欧洲社会学家们对社会距离的论述。

^① 李强：《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社会学研究》1995 年第 4 期。

1. 塔尔德的社会距离观点

法国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和迪尔凯姆都是孔德社会学思想的后继者。塔尔德走向了心理学的道路，而迪尔凯姆在孔德开辟的社会学道路上继续前进。塔尔德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名气和迪尔凯姆相去甚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不光是因为迪尔凯姆代表着正宗的社会学传统，也与迪尔凯姆主持了当时的权威杂志《社会学年鉴》，并以此为阵地形成了在社会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法国“年鉴学派”有着密切关系。

塔尔德对社会距离的认识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模仿律》一书中。在该书中，塔尔德从两个含义上使用距离的概念，其一就是一般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距离^①，其二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距离。塔尔德曾使用距离来指称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性——文明的距离。塔尔德认为，一切文明即使是截然不同的文明，也是由远古文明发展而来的，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小，语言、神话、手工艺、法律、科学和艺术一直是沿着既定的道路走得越来越近。他认为，文明的进程表现为逐渐拉平、走向均衡的过程，实现均衡的地域越来越宽广。不管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之间，还是在同一民族内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之间，文明的相似性都是模仿的结果。塔尔德指出，由于每一个发明通过模仿而保存下来并得到扩散，非对抗性的发明就逐渐积累，每一个发明通过模仿而成为辐射的中心^②。

塔尔德指出，模仿在人身上的表现是从内心走向外表的。思想的模仿走在思想表达之前，模仿的目的走在模仿表达之前^③。

①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36页。

②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42页。

③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49页。

塔尔德使用“阶级之间的距离”来说明阶级之间的拉平化或阶级界限的消失。他认为，嫉妒是从外在行为上模仿的欲望，是继服从和信赖之后的结果，是社会变革的症候，揭示了阶级关系的消失。社会变革缩短了阶级之间的距离，减少了阶级资源的不平等^①。

塔尔德在论述模仿从范本到副本、从高位到低位的下行过程时，使用了社会距离的概念。他指出，一般而言，高位人引起低位人的模仿，平民模仿贵族，乡下人模仿城里人。但有时高位人也模仿低位人，只不过模仿的程度要小得多。两个人长期相处，无论其地位多么悬殊，他们总是会相互模仿的。模仿的趋势就是把人的地位拉平。

塔尔德还指出，地位最高、距离最近的人是更容易成为模仿对象的人。这里所谓的距离就是社会距离^②。“如果从低到高的模仿是无条件的，那么最优越的对象就必然是被模仿得最多的对象——然而实际上，被模仿得最多的对象却是最优越的对象中那个距离最近的对象。事实上，模仿对象具有的典范的影响力既和它的优越性成反比，又和它的距离成反比。这里所谓距离是社会意义上的距离。从这个观点来看，无论陌生人的空间距离是多远，只要我们每天和他有相当多的联系，只要我们很容易满足自己模仿他的欲望，他就在我们身边^③。这就是以最接近、社会距离最短者成为模仿对象的规律。这条模仿律可以解释最高级的社会阶层作为模仿对象逐渐连贯向下传播的性质。地位低的阶级模仿地位高的阶级时，我们就可以推演出一个相关的结论：高低两个阶级的距离缩短了。”^④

这样，我们就对塔尔德的社会距离理论有了一个粗略的认识：首先，地位低的人模仿地位高的人；其次，每天和高地位人的联系

①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45页。

②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61页。

③ 也就是说距离很近。在这里，判断距离远近的标准是与模仿对象接触的频率。

④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61页。